



策划：张徽贞 周红红

“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崔树喜：抱着冲锋枪时刻待命

齐斐斐 崔治营



刚见到崔树喜时，老人家正坐在外间屋的小马扎上慈祥地看自己养的一窝小兔子。老人的房间不算大，陈设简单，但桌上的一张黑白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中的年轻人浓眉大眼，英俊帅气，那是他年轻时的模样。

老人是南皮县刘八里乡八里台村人，虽然已88岁，但身板还很硬朗，精神矍铄，举手投足间仍有老军人的飒爽英姿。老人说，那张黑白照片就是在参军入伍前夕照的，当时还不满20岁。那年是1952年，11月初，县里掀起一股参军援朝热潮，血气方刚的他积极报了名。入伍后他们这批新兵也没进行严格训练，只学了一句简

单的英语（缴枪不杀）就坐上火车到达安东，又从安东坐车进入了朝鲜。战后，才知道他们是上甘岭战役正酣时紧急补充的4000名新兵。

入朝后，他被编在409团，连长叫温敬华。当时他们连驻在上甘岭附近的小帽山。整整一个白天，美军的炮火不间断轰炸，全连四个排只能分散隐蔽在几个坑洞里。老人怕我们不懂什么是坑洞，站起来打着手势说，坑洞就是依托地形挖的山洞，一个坑洞差不多能容纳一个排，当时他们排48个人。如果没有坑洞，在美军那么密集的炮火下，志愿军很难站住阵脚。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害怕吗？”老人笑了笑用标准的南皮话说：“害嘛怕啊，全都是抱着冲锋枪等着拼命。”

说着，老人先做了个抱枪的姿势，又拿手比划了一个圆圈说：“冲锋枪是苏联制造的，4个子弹盘，一盒子弹74发，一梭火就一大梭子，解气痛快！”

老人说，坑洞里很潮湿，洞顶老是漏水，这个漏水不是普通山洞那种漏水，是坑洞上方有孔隙，从那孔隙里往下渗水。这水从哪来的，能不能喝，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敢喝。但是那水老是滴滴答答地掉，也怪让人痒得慌。一次，趁着美国人炮火稍微减弱喘口气的空儿，排长让一个战士拿

苦布去洞顶苫一下，不成想这名战士刚上边展开苫布，美国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美军飞机一见这儿有坑洞，便不停地扔开了炸弹，眨眼间，坑洞就塌了，一个排的战友全被埋在了碎石头下，几位战友因此牺牲。老人说到这里，眼里溢出了泪花。

就这样，他们被转移到了后方医院。在医院里住了4天，发现腿没断，也没有其他大伤，还能跑，他也没跟院长打招呼就又跑回到了前方。这次他赶上了上甘岭战役最后一仗。

“当时美军就跟疯了一样，先是飞机大炮，然后步兵跟着坦克往志愿军阵地上扑，当时志愿军已经从前期的作战中总结了减少伤亡的经验，那就是不在狭小的阵地上一次摆上很多兵力，一个火力点上两三个人，哪个火力点上的人牺牲了，就派人顶上去。这一仗打下来，全连就剩下4个人。”老人说，现在一闭上眼，还经常看到连长温敬华眼望着战士们的一具具遗体大声痛哭的样子。

1957年初冬，崔树喜回国，而后退役，回家一直务农。

采访结束时，老人颤颤巍巍地拿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挂在胸前，眼里沁满泪水，心中无限荣光。

于东林：通信兵一天行走90公里

齐斐斐 王洪盛

一天一宿步行90多公里，双脚都是肿的。为了完成任务，他经常在黑夜穿越火线，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讲述者叫于东林，90岁，盐山县西门外村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野战军某部战士。在盐山县韩沙洲村换上军装，直奔济南，参加了济南战役。战役结束后，又跟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参加上海战役后，于东林成为一名通信兵。凭着机敏、勇敢，他将通信兵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跟战友们一起多次出色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作为第二批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东林从泰安坐火车到达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于东林所在部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238团。当时238团入朝第一战邂逅的竟然是美陆军第一骑兵团（号称美军第一王牌师），战斗打得很艰难，人员伤亡惨重。后来国内补充兵员，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有一次相遇“联合国军”，敌人分散转移进山，于东林所在的部队进行地毯式搜索。敌军眼看不敌，投降后竟然拿着志愿军的政策宣传单，知道我军优待俘虏，不虞性命之危。就在那次，志愿军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俘虏了多名敌人。

后期，于东林所在团参与了攻打敌军飞机场、狙击联合国军空降兵的重要任务。敌人用的基本上是半自动步枪，而志愿军大多用的还是老式步枪。志愿军运用游击战、夜袭

战等经典战法袭击敌人，艰难地取得一步步胜利。

面对自然环境恶劣、后勤补给困难、武器落后等重重困难，于东林和战友们没有退缩，渴了喝口水，困了在冰天雪地的雪窝里倒头就睡。作为通信兵，那个时候靠两条腿走路送信，一天一宿能走上90多公里，双脚肿得像面包一样。那时，他还经常在黑夜穿越火线，通过封锁口，有时候只能从尸体上爬过去，身上沾满了血迹，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战场上瞬息万变，往往去的时候是一个灯火通明的村庄，回来时却变成了残垣断壁。一次，于东林完成任务返回团部的途中，经过一片废墟，发现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围着早已死去多时的妈妈找奶吃。于东林看着可怜，抱起孩子找到当地的朝鲜人，把孩子

托付给他们，保全了一个小生命……

于东林入朝陆续参加了5次战役，可谓九死一生。当问起老人：“当时不怕死吗？”老人淡淡地回答说：“当时的人呐，就一个思想，你消灭敌人，就是保存自己；你消灭不了敌人，就保存不了自己……”

战斗的日子很艰苦，但是志愿军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熬过了那段硝烟弥漫的日子。1952年，于东林随志愿军返回国内，曾到某步兵学院深造学习。1954年，因病退伍。回到老家盐山后，在县电信局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入党几十年的老兵，一辈子都在为国家奉献。“一次从军，终身光荣，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当年的历史，更不会忘记从硝烟中走出的人。”说这话时，于东林老人目光坚定。



马秀云 弹片留在身体里

齐斐斐 王洪盛

盐山县韩集镇南马庄村，有位93岁的老人马秀云。参加过解放战争，至今体内还有弹片。虽然这些残留的弹片常会令他疼痛，但他一直自豪地认为，那是他一生的荣光。

马秀云出生时，正是国共内战时期，年幼的马秀云目睹了战争的阴云，7岁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又踏进了他的家乡。他的父亲马学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学胜的家也就成了附近党员干部的临时党支部。盐山、孟村一带的共产党领导人王俊峰、刘格平、仇洪印等经常在南马庄村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少年马秀云受父亲的影响，担负起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任务。

在一次伏击战中，马秀云的爷爷被日寇打死，四爷爷被日军活埋。马秀云泣血立誓，要为死去的两个爷爷报仇。采访中，提起家仇国恨，老人热泪盈眶，情绪非常激动，看得出，这种仇恨是老人一辈子的痛。

1944年1月，刚满18周岁的马秀云加入冀鲁边区海防支队，驻防歧口，担任政委席华亭的警卫员。后加入通信排，先后参加歧口、羊二庄、小山等地的对日作战，总共歼灭日军七八名，缴获步枪一支。在杨二庄战役中，他的右腿被日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受伤，至今体内还有作战时留下的弹片。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兵围剿歧口根据地，马秀云在掩护一名群众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他

郑秀桐 参加过开国大典

杨静然 高菁 李冠达



黄骅市旧城镇霍马口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居住着曾参加过开国大典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九旬老兵郑秀桐。“这是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的三等功证书，这是抗美援朝纪念章……”那张三等功证书，纸张早已泛黄，却被老人一直精心珍藏，因为它承载着他的峥嵘岁月。

1948年，17岁的郑秀桐参军入伍，成为坦克兵第一师摩托化步兵团的一员。1949年，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前整齐亮相，战士们练得异常辛苦。从稍息、立正、齐步走开始，每步幅都严格控制在75厘米。

郑秀桐回忆，那时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高强度训练下，不少战士都晕倒在训练场上。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所有战士热情高涨，白天练不够晚上接着练，脚上起了泡挑破接着练，脖子晒脱了皮，撕下来接着练。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阅兵仪式正式开始。此时的天安门已是人山人海。已经准备充分的战士们一扫疲惫，个个精神饱满走上了长安街。

“我隐约听到了喇叭里传来毛主席的声音，广场上一下就沸腾了。”郑秀桐说，短短几分钟，他所在的方队走过天安门，在扭头敬礼的一刹那，他远远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朝队伍挥手致意。”那一幕，他终生难忘。

1950年，郑秀桐随部队开赴朝鲜，从北京丰台踏上了前往朝鲜的火车。两天后，到达朝鲜。

起初，他在坦克第一师司令部做通讯员，后来改编到运输营3连1班负责运输坦克炮弹、军粮等物资。每次运输，他都会和另一名战友开车将炮弹等物资，从安东运送

到“三八线”附近，为前线部队做战备补给。

“当时的运输路线被敌人炸得坑坑洼洼，运输车辆必须进行伪装，车上插满了树枝、树叶，车身抹了黄泥，车灯也都装上了防空罩……”他说。

白天，敌军的飞机轰炸不停，夜晚，敌军休息了，志愿军部队的车辆才拉着炮弹摸黑前进。“有一次，被敌军发现了，飞机一下子飞了过来，炮弹在身边‘隆隆’爆炸，司机拼了命地往前开，躲进山里头隐蔽起来。”郑秀桐老人说，但还是有不少战友牺牲了。

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鸭绿江大桥被敌机炸毁后，志愿军战士很快用木头捆绑在一起，临时搭建起一座木头桥，以便运输炮弹等物资的车辆通过。“行驶在木桥上，即使知道前面就是敌人枪林弹雨的攻击，也没有人退缩。我们当时就想，快点把炮弹运送到前线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郑秀桐经过重重考验，磨炼了坚强的意志。由于表现优异，他成为当时所在连队里唯一一个受到三等功嘉奖的士兵。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郑秀桐随部队回国，被分配到甘肃省工作。1962年，由于家庭原因，郑秀桐解甲归田，回到老家。如今，每每看见电视上播出关于抗美援朝的节目，老人激动不已，尤其是看见战士牺牲在战场时，他更禁不住落泪。

“每次看到这情景，我都会想起曾经的那些战友，很多已经牺牲在了战场上，有的也失去了联系。”他说，虽然曾经那段岁月很艰苦，但是如今回想起来，再苦再累都值得。

北京有座 “张树楨高地”

齐斐斐 赵华英



在今天的北京市延庆区东南方向，昌平区与河北怀来县的交界处，有一处名为“黄楼洼”的山峰，海拔1439米，属长峪城下七隘口之一。在“黄楼洼”西南，有一处小山，名为“张树楨高地”，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一位少将团长而命名的。这位名为张树楨的团长，他的家乡是河南南乐路村。

张春杰是张树楨的重孙辈，身为教师的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红色文化。在保定军校第九期同学录中，他找到了张树楨的名字，并收集了大量关于南口战役的文史资料。

1937年7月底，日寇占领北平、天津后，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展开侵略。南口镇位于北京西北45公里，地处燕山余脉与太行山交汇处，南北两侧则是筑于高山脊背的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穿行，被称为“缓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

1937年8月，日军调遣重兵扑向南口镇，意图从此侵占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中央军及附近中国各抗日军队向北平推进，中国守军在南口及长城一线集结了6万多人的部队，与7万日寇精锐部队展开一场激烈的拉锯战。

张春杰说，张树楨自参军后很少回家，直系亲属都在外地，少有联系。张树楨1919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3年8月毕业后到晋军服役，在晋军从最基层的排长、连长一路升职至营长、副团长。1937年任陆军第72师416团上校团长，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随第72师师长陈长捷将军，从晋北一线进驻怀来县镇边城，以屏障南口侧翼，阻击日军沿平绥路西进。

我军在南口和居庸关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破，遂向西寻找突破口。敌军凭借火力优势，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我军右翼阵地被攻破，日军进驻镇边城、横岭城、骡子圈一线。张树楨奉命增援，敌我两军于8月21日在骡子圈一线展开激烈战斗。

8月22日，第四师骡子圈阵地失守。张树楨闻听消息，心急如焚，当即率领部队增援。欲夺回骡子圈，非要站稳850高地不可。张树楨指挥第一营猛攻850高地，第一营李营长身受重伤，不幸牺牲。万分火急之下，张树楨又把第二、三营派上前线，日寇在空中火力支援下猛攻，枪弹如雨倾泻在我方阵地上。三营营长孙瑞祥壮烈阵亡，阵地被敌方占领。张树楨不甘心败退，决定乘天黑之机，夺回阵地。在冲锋之前，张树楨对官兵讲话：“保家卫国乃军人天职，神圣领土一寸也不能丢，我们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不成功便成仁！”

在夜色的掩护下，敌方的枪炮优势部分失去，张树楨带着敢死队冲去，经过一夜的白刃血战，终于夺回阵地。此时张树楨腿部负了重伤，简单包扎后，在卫士搀扶下，又亲上高地，命令团副和二营长加紧筑牢工事，作好防守准备。果然，半夜时分，日寇以密集炮火发起进攻，双方在阵地上混战一天。面对强敌进攻，第416团一营官兵拼死防守，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全营官兵战死在850高地，无一缴械投降。此次激战，850高地两度失守，张树楨也壮烈牺牲，以身殉国，年仅39岁。

张春杰说，张树楨临终前，胸部、腿部连中数弹，仍命卫士扶他上山，不忘书写作战报告。当时，他坐在地上，忍住剧痛写道：“850高地夺回，职重伤不支，部队和阵地，命团副……”最终，团副的名字尚未写出，张树楨便因失血过多、身体不支，牺牲在850高地上，报告也成绝笔。为了追念他的英勇和功勋，张树楨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少将。850高地也被命名为“张树楨高地”。

这场“淞沪会战”齐名的南口战役，整整浴血奋战18天。最终中国军队虽败犹荣，以伤亡3.3万人的代价，歼敌1.5万人，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3个月亡华的妄想。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